

问题,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国的城镇化一开始就是在农村改革分离出剩余劳动力基础上,农民在农村发展非农产业的同时建设小城镇,从而创造了农民自己转移自己的城镇化道路。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又开启了离土离乡的城镇化道路,农民工成为城市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进入新时代后推进的新型城镇化,突出人的城镇化,城镇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中国的城镇化始终是尊重群众创造,以人民为中心,城乡协调发展。这条道路是中国创造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重要体现。

中国 70 年的发展实践与发展 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樊 纲

中国经济在过去 70 年中的伟大实践,为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经验与新的案例,它们可以论证已有的一些经济学理论,也可以为新理论的形成作出贡献。这里我们只讨论一下中国实践,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两点新的启示。

第一点启示是,70 年经济发展实践说明,计划经济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但这不否定政府可以在市场化发展的道路上起到积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不久就开始实行了苏联式计划经济,直到 1978 年改革开放,才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前后经济发展的成果,首先是证明了计划经济不是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只有发挥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经济才能高效、持续地发展。但是另一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历史都证明了,如果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以至中期阶段),只有市场竞争,没有政府发挥适当的协调、稳定和促进的作用,经济发展也很难成功。一是市场经济的不稳定性很容易把一个国家的经济拖入周期性的经济波动中,一次次的经济过热与经济危机会把前期增长的成果消耗殆尽,甚至陷入各种各样的“陷阱”当中,长期停滞。二是,发达国家的企业已经很强大,占领了市场,有着较强的竞争能力,而落后国家的企业如果也只是在市场上与它们同样地竞争,没有政府一定程度的保护与扶持,这些弱势企业就很难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一方面得益于市场化改革,全面实行了市场经济体制,但另一方面,并没有放弃政府对市场的调节作用。中国经济的一大奇迹可以说还不是 40 年高增长,而是 40 年高增长却没有出现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宏观经济基本保持平稳。与此同时,政府实行了一系列的产业政策,较为有效地使中国的企业逐步地发展起来,逐步地学会了市场竞争的本领,并且在市场开放、引进外资的大框架下,使中国的一批“幼稚工业”得以发展起来,在“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过程中,实现了越来越多的“进口替代”。

总之,中国的发展证明了,对于那些落后的经济体来说,政府在校场化发展进程中发挥有效的作用,对于解决一系列早年发展经济学中所讨论的那些“发展难题”,是一个重要的制度保障。

第二点,中国 70 年的发展轨迹,对于发展经济学而言,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后发优势”在持续发展中的作用更为重要,而“比较优势”这个历来受经济学家重视的因素,实际并不很

* 樊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邮政编码:100081。

重要。

所谓发展中国家，其实就是“落后国家”，在发展初期，这种落后表现在增长要素的各个环节上往往是处处落后：要钱没钱，人口不少但教育落后，人力资本匮乏；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企业管理不善，科技落后，缺乏创新能力，等等。但在这种条件下，你还需要更快地增长，要比发达国家增长得还快，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缩小差距（这才是真正实现了“发展”）。这时发展中国家怎么办？在要素结构的问题上处处落后，就需要寻找一些“发展的要素”，即一些可以在某些领域里获得竞争力的“相对优势”，实现经济增长的起步，并一步一步地改善增长要素的结构，实现持续的增长。

所谓的“发展要素”一般说来就是两种：一是“比较优势”。劳动力便宜，就可以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获得劳动成本相对较低的竞争优势，为落后国家挣得“第一桶金”。二是“后发优势”，也就是作为后来者可以通过学习和模仿，利用世界上前人所积累的很多不受或已经不再受专利保护的大量的技术和知识，包括社会科学和管理学的知识，来加速我们的发展；我们可以学到别人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些经验与教训，我们可以少走弯路，节省试错成本，可以走捷径，等等。

在这两个主要的相对优势中，哪个更重要？一些学者反复强调的是比较优势，打开任何一门发展经济教科书首先讲的也是比较优势，客观上说一个落后国家在一开始也就只是有廉价劳动力这一个发展要素。但是，如果只有这个要素来支撑增长，增长不会持续，也解释不了像中国这样的 40 年的持续增长。中国还是人口大国，20 多年后就开始遇到了劳动力短缺（当然我们有我们的特殊问题导致农民工在城市住不下早早就退出了劳动供给），其他人口小国用不了几年劳动力就会用光，还怎么发展？现实中，很多发展中国家也是因为仅仅发挥了比较优势（包括自然资源上的优势），没过多久，经济就出现了停滞，经济增长就没能实现一个长期持续增长而真正缩小差距。

要解释中国最近这 20 多年的持续增长，最重要的已经不是比较优势，而是“后发优势”。因为后面的 20 年里我们看到的已经不仅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而是各行各业的发展，看到了技术的进步，看到了高新科技产业的产生与发展。这里就要注意到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的差别。比较优势是较低的劳动成本产生的竞争力。但有这种竞争力的只能是在一部分产业当中，即劳动密集型产业当中，而且只是在比较低端的、不需要很高技能的组装与服务环节上。而后发优势不一样。它的本质是以较低的学习成本和试错成本，以较快的速度缩短知识与技术上的差距，它可以发生在所有的领域、所有的产业当中，使得经济取得全面的增长，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而且它不仅在生产活动中存在，在诸如体制改进等这些领域里存在着。作为后来者，通过在开放的过程当中，学习、模仿、引进、吸收，使知识和技术的增长可以更快地接近前沿。中国 40 年高增长，后来这 20 年，应该说我们越来越多地是依靠这个后发优势。

而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比如中美贸易摩擦，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停止科技交流、对中国企业“高科技产品断供”、试图与中国科技“脱钩”，其实是从反面证明了发挥“后发优势”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现在还只是在搞劳动密集型，美国人不会这么紧张，不会在科技知识交流上这样地大动干戈！我们经历的这些历史，都给了我们新的资料，也让我们认识到了发展的困难，也使我们得以更加清晰地分析发展经济学的逻辑。

概括地说，落后国家的发展都要经历这么几个阶段：第一，纯粹依靠比较优势；第二，进入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同时起作用的时期，这里的前提是要在一开始的时候，也就是在第一阶段的时候，就要开始对外开放，学习模仿，主动地受益于“知识外溢”，积以时日，才能在后面的阶段上接续起来，支撑发展；第三阶段，继续学习模仿，同时也到了加大自主创新的阶段了，我们现在就到了这个阶段。一方面我们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使得我们的企业和研究机构，逐步到达和接进了科技前沿，

逐步具备了自我研发的能力;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也迫使我们必须进入自主创新的阶段了。我们能不能在过去基础上有更大的、持续的发展,这确实要取决于我们是不是能够做得更好,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首先是改革能不能深入,能不能提高我们体制的效率,真正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其次就是能不能在自主创新上实现真正的突破。科技创新这些事情不是政府补贴能够补贴出来的,不是政府“决定”就能发展出来的,而是要通过一套机制,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投资机制、激励机制,才能使得创新不断地发生。

发展中国家遇到的一些困难,遇到当前我们遇到的这类问题,其实是符合逻辑、符合规律的。从一开始我们就说所谓发展就是在有人比你先进、比你强大、而且他们已经统治了市场的情况下我们要赢得一席之地,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现在,一些国家动用国家力量打压我们的企业,也是利益冲突的一种延伸。在这个意义上,中美贸易摩擦这样的事情,也为发展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案例”。

作为中国经济学者,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把中国实践对理论的启示,发掘出来,梳理出来,概括出来,为经济学大厦添砖加瓦做出我们的贡献。

如何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炼为 原创性经济理论^{*}

洪永森

一、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

据经济史学家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估算,鸦片战争前的 1820 年,中国 GDP 占世界经济总量的 32.9%,居世界首位,其时西欧各国的总和为 23.6%,美国和日本分别占 1.8% 和 3%。鸦片战争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中国经济长期遭受掠夺,加上战乱频仍,国力日益衰微。新中国成立时,中国 GDP 占世界经济总量已降至 5.2%。受“文革”影响,到 1978 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 GDP 跌至历史低谷,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为 1.8%,只有美国的 9.4%,排在世界第 11 位,人均 GDP 更是排到世界第 134 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经济从此驶入快车道,国民经济以年均 9% 的速度增长。2010 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8 年,中国 GDP 达 13.6 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 16.2%,是美国 GDP 的 66.3%;人均 GDP 达 9608 美元,跃升至世界第 68 位。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发展成为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以及第一大外汇储备国,重新回到世界经济舞台中心。中国建立了全球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生产任何一种产品的原材料、中间材料,都可以在中国找得到,而且从产品设计、生产加工到销售等各个环节,均具备成熟的供应能力。中国的科技实力进一步增强,主要科技创新指标稳步提升,2018 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 3184 亿美元,研发经费占 GDP 的比重超过欧盟 15 国的平均水平,成为全球第二大研发大国,而研发人员总量、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均居世界首位。虽然整体上与西方发达国家技术水平还存在相当大的差

^{*} 洪永森,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王亚南经济研究院,邮政编码:361005。